

依据《2000财年国防授权法》要求

美国防部向国会提交报告

关于中国军事实力年度报告

总装备部情报研究所

依据《2000 财年国防授权法》要求
美国防部向国会提交报告

关于中国军事实力年度报告

总装备部情报研究所

二〇〇〇年七月七日

目 录

依据《2000 财年国防授权法》致国会的报告	(1)
关于中国军事实力年度报告	(1)
I. 中国大战略、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目标	(1)
A. 中国的大战略	(1)
B. 中国的安全战略	(6)
C. 中国的军事战略	(8)
II. 中国军事学说和部队结构的发展	(9)
A. 中国军事学说的发展	(9)
B. 部队结构现代化	(12)
C. 增强军事能力的先进技术	(13)
1. 信息和通信的发展	(13)
a. 自动化指挥、控制、信息系统技术	(13)
b. 电子战发展	(15)
c. 信息对抗/信息战	(15)
2. 航天发展	(16)
3. 其它技术的发展	(19)
a. 反辐射导弹发展	(19)
b. 导弹防御的发展	(20)
c. 水下作战	(21)
d. 反舰巡航导弹	(22)
e. 隐身技术	(23)
f. 激光武器	(23)
III. 台湾海峡的安全形势	(23)
A. 中国战略与常规部队(包括可用于对台作战部队)概况 ...	(23)
1. 导弹部队	(23)

2. 空军	(25)
3. 海军	(26)
4. 陆军	(27)
B. 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包括可利用的解放军对台军事打击 行动的预警时间	(28)
C. 对解放军遂行战区导弹与空中打击、信息战和特种作战的 一体化协同能力的评估	(29)
D. 对台湾面临解放军一体化进攻时维持空中、海上与地面作 战能力的评估	(30)
E. 对 1999 年台湾威慑部队面临挑战的评估	(32)

依据“2000 财年国防授权法”致国会的报告

《2000 财年国防授权法》指示国防部长向国会提交一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与未来的军事战略报告。报告应说明人民解放军现在与未来军事技术发展趋向和未来 20 年中国的大战略、安全战略、军事战略、军事组织、作战概念的可能发展”。

本报告应《2000 财年国防授权法》的要求,着重说明以下三方面的问题:①中国的大战略、安全战略、军事战略;②中国的军事学说和力量结构的发展,包括能提高军事能力的先进技术的发展;③台海安全形势。

关于中国军事实力年度报告

I. 中国的大战略、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目标

A. 中国的大战略

中国的主要国家目标是成为一个强大、现代化、统一和富强的国家。它对比其他“大国”的地位来看待自己的国家名望。北京显然希望被视为是一个真正的大国。中国自认为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它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核力量、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以及迅速增长的经济使其具有一个大国的许多特征。它想与其他大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方面享有同等的地位。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北京相信最迟到 2050 年能够达到“中等”大国的水平。中国希望通过足够的实力使其成为亚洲的杰出国家,以致于任何其他国际行动者如果不首先考虑中国的利益,它在亚洲就根本不可能采取任何重大的行动。

中国的分析家认为,国家地位由其“综合国力”来衡量。在 70 和 80 年代,中国已故领导人邓小平的一些战略顾问研究的方法推动了这种计算方法。该方法依靠的是对一个国家多层综合国力体系中关

键部门或分系统的动态进程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利用这一方法,中国的分析家衡量国力的四个分系统是:①物质或硬能力(自然资源、经济、科学与技术以及国防);②精神或软能力(政治、外交、文化和教育);③协调能力(国家发展的领导机构、指挥、管理和协调);④环境能力(国际、自然和国内环境)。

以西方国家的观点,中国政府还没有明确地阐述指导其行动和处理国际事务的“大战略”。事实上,中国领导人的主要精力用来处理国内事务,尤其是维护国家统一和国内安定。我们可以从中国高级领导人的声明、政府的计划文件以及与政府相关的文件推断其“国家发展战略”差不多就是中国的“大战略”。

中国的大战略旨在全面发展国力,以实现其长期国家目标。这个大战略被中国定义为“国家发展战略”,是邓小平在70年代末最先提出来的,以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江泽民为核心的邓后集体领导层再一次确认了这一战略。这一发展战略是基于这样的设想,即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的主流趋势以及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情况下,经济力量就成为综合国力的一个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因素。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把促进经济的快速和持续增长、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利用并开发国家的陆地和海洋资源以及保证中国利用全球资源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

尽管该发展战略认为经济力量是综合国力中最为重要的因素,北京的战略也把发展军事力量放在改革开放政策的第二优先序,以确保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维护重要的国家利益,以及为最终扮演大国角色并可能成为亚洲杰出国家的政策提供保障。不过,邓小平后的中国领导人已经把军队现代化放在“四个现代化”的第四位。在科索沃“盟军行动”之后,尤其是1999年5月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后,中国的一些官员已经认真考虑重新排列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优先序,他们希望加强国防建设。但是,1999年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中国的高层实权领导再次强调了优先保持经济增长、科学与技术

发展、资源利用与开发的重要性。除了发展国力资源“硬件”(自然资源、经济、科学与技术、国防)外,一些分析家认为,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寻求增强国力中的政治、外交和经济等“软件”,认为它决定国家资源能力的有效性。北京正在通过以下措施增强其国力“软件”:完善国家政策和决策能力;改善对外政治、外交、经济和军事关系;增强在多边机构(包括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东南亚地区论坛和亚太经合会)中的作用并做出贡献;使人均收入达到发达国家的全球标准;把人民的社会生活质量(包括健康和教育)提高到与世界发达国家相当的水平。

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也把加强国力的“统一”和“协调”放在特别重要的地位,这是基于国力的物质、政治、外交与经济(硬件)的发展和精神(软件)建设需要宏观控制和协调的认识作出的。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高层领导经常强调“党的建设”的重要性,这涉及到调整和加强党和政府的管理机构,以及更新和培养党的领导于部接班人。中国共产党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和政治局常委通过由江泽民任主席的中央军委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绝对领导。对国力的硬件和软件有影响的国家各计划项目的管理由几个政府部门实施,尤其是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以及国防科工委。各部门间的协调和政策的制定是由一些秘密的所谓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些“领导机构”进行的,包括外交事务领导机构、台湾事务领导机构、金融和经济领导机构以及中央军委。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高层领导行使决定权。

在追求国力硬件和软件各方面的协调发展的过程中,一些中国分析家认识到,环境的“制约条件”会消极或积极地影响一个国家发展硬、软件的能力。特别是,中国认为国际(世界格局和不同力量的平衡)、自然(资源、地理和生态)以及社会(政治、经济和社会及其稳定性)环境会直接影响国家发展的方向和步伐。因此,中国的发展战略强调促进积极的环境影响,把消极的影响降到最低。1985年以来,中

国开始促使全球力量平衡从“两极”向“多极”发展，并广泛在周边和国际舞台寻求和平稳定的安全环境。过去十年，中国已提高同自然灾害（诸如洪水、干旱、地震、瘟疫、饥荒和森林火灾等）斗争的能力。由于地理和历史居住方式，包括土地开垦等原因，中国对付上述自然灾害的能力还很不足。中国还在寻求更加充分地利用自然资源和发展部队的投送能力，以保护其进入资源十分丰富、有争议的中国北部海域、东海和南海海域。此外，中国正在通过笼络和强制手段保持国内社会环境的稳定，在这种国内社会环境下，经济改革措施已经成了或加剧了国内政治的、农村的、犯罪的和民族动荡的根源。有证据表明，中国将很快采取措施阻止或镇压任何持不同意见的新源头，包括类似宗教的“法轮功”。1999年，“法轮功”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政治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过去十年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尤其是去年发生的事件已促使中国的一些精英人士对中国长期温和的安全估价提出严重质疑：“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流，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以及全球力量平衡正从“两极”转向“多极”。中国的高层领导主要担心的是美国企图通过遏制中国的发展和防止俄罗斯实力的恢复来保持其在欧亚力量平衡中的主导地位。北京估计华盛顿试图通过加强与东京的同盟关系以及把北约扩大到东欧，以保持其“单极”大国的地位。中国认为，俄罗斯国内的问题使其无法在扼制美国在欧亚的支配地位方面持续发挥作用。此外，中国察觉到新的《日美防卫指针》使日本的军事行动可以超出其以前的防卫态势，并且促使日本提高其在亚洲的军事力量。北京还认为，美国发展国家和战区导弹防御计划将对中国的核威慑的可信度提出挑战，并认为这两项计划最终会扩大到保护台湾。中国认为这是干涉其内政的举动，并且会使中国建立对付台湾的威慑性常规战区导弹的计划复杂化。

在科索沃“盟军行动”成功后，北京认为，在处理潜在的美国插手中国内部事务或军事干涉中国冲突事件方面将越来越困难。中国许多有识之士指出，美国对科索沃的干涉是美国最终对中国台湾海峡

或南中国海冲突采取军事行动的先兆。他们认为，华盛顿将会公开或隐蔽地干涉北京与西藏少数人或中国西部穆斯林少数派的内部争论。北京还认为，美国在科索沃进行干涉的先例加强了美国对一场北朝鲜危机进行干涉的倾向，这是一种对中国在朝鲜半岛长期存在的利益进行挑战的行动。美国对莫斯科在车臣的军事行动采取不干涉态度稍微缓解了中国人对“盟军行动”先例的关注。他们的依据是：与南斯拉夫不同，中国和俄罗斯保持着核能力。然而，北京对于美国对有中国卷入的潜在冲突进行军事干涉的基本关注仍然存在。

从中国的观点看，这些国际趋势正在形成一种“限制”北京发展的国际环境，这种发展包括国力的硬、软能力的发展，即物质、政治、外交和经济等。中国认为，这些趋势表明北京难以和华盛顿发展特殊关系，这样会从根本上抵消美国任何“牵制”中国的意图，或者会鼓励美国与中国合作以抵消日本日益强大的力量。并且，在对这种负面安全环境作出反应时，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在发展抵消美国在欧亚大陆的力量所需的国际支持方面手段有限。据报道，自1999年5月7日中国驻贝尔格莱德的大使馆被轰炸以来，中国领导人一直在讨论抵消美国力量的办法，包括加速军事现代化，追求与俄罗斯的战略合作，以及增加中国在海外的扩散活动。然而，这些办法中很可能没有哪一项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北京的地位。

中国似乎还没有得出结论，这些办法的哪一项将对改善其安全环境是必须的。在90年代初期和中期制定国家发展战略时，中国高层领导人顶住了国内要求提高国防发展重要性的压力，因为担心这样做会使确保中国经济增长和现代化的计划变得复杂化。北京相信，经济增长是其保持国内社会环境稳定战略中的重要因素。并且，对外贸易和投资联系是国力中物质（硬件）方面经济发展的核心。中国领导人还认为，提高国防的优先序只会加强华盛顿牵制中国的努力和证明日本提高其军力的企图是正确的。过去十年中，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战略家不断地告诫中国领导人：避免受美国煽动而陷入不平

衡的军备竞赛,那可能使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出轨。

虽然中国在寻求抵消美国力量方面的办法有限,但是其安全政策和立场日益包含着从政治上直接或间接挑战美国安全政策和立场的主题。北京经常公开或私下里发表声明,控告美国从事“霸权主义”的国际活动。中国还宣布一种“新安全概念”,提倡把国际安全建立在多边对话和各国保证对其他国家的内部事物放弃使用军事威胁、强迫和军事干涉的基础之上。特别是,这一新的安全概念批评作为冷战遗物的双边和多边安全联盟,说它削弱而不是加强了国际安全基础。过去三年中,中国在各种外交场合或公开的论坛会上,将这个主张与美国加强美日安全同盟和鼓励扩大北约的努力相提并论,在一层薄薄的面纱掩盖下批评美国的欧亚安全政策。最近,中国与俄罗斯合作成功地游说了其他的联合国成员国,支持一项批评美国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联合国决议。

中国对美国安全政策方向的批评,部分地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华盛顿“牵制”与“包围”中国和鼓励日本扩大防御范围努力的真实关注。北京认为,日本扩大防御范围会削弱地区安全基础。然而,这种批评也受中国的下列认识所驱使:美国的政策正在构建一种“限制”北京努力发展综合国力——包括物质(硬)和精神(软)——的“国际”环境,并且使中国成为亚洲杰出国家的努力复杂化。面对一个缓和的安全环境,中国认为,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可以集中精力进行“和平建设”,发展综合国力。高层领导正在日益对冷战后时代的这一形势提出质疑。

B. 中国的安全战略

中国谋求成为东亚地区国家中的强国。北京正在推行地区安全战略,旨在维护其在台湾、南中国海以及周边的主权利益,保护经济利益,促进地区稳定。

北京优先考虑的是阻止台湾进一步走向永久分裂,其长远目标是在中国提出的条件下实现最终统一。中国还试图反对日美之间正

在加强的军事合作,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同时,它将继续重视那些从引进日本技术、外国投资以及商业贸易中得到的经济利益。维护朝鲜半岛稳定也是北京的地区安全目标之一。中国在东亚的其他重要安全目标包括:阻止发展和部署战区导弹防御(TMD)系统,特别是该系统涵盖台湾时;保卫它在东海和南中国海的主权;以及通过像“东南亚国家联盟”、“亚太经合会”和“东南亚地区论坛”这样的组织来促进其政治和经济利益。

北京在该地区作用的形成,将取决于北京与华盛顿的关系、北京对美国与韩国、日本、澳大利亚纽带关系的理解力。中国可能将通过有关边界问题、贸易和投资,以及军售方面的合作,继续增进与俄罗斯发展“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在南亚安全利益的核心是巴基斯坦和印度(两国都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以及北京希望在次大陆维持和平与稳定的意愿。在中亚,北京将保持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向新疆扩散的关注,同时进一步发展与周边国家开展能源合作、贸易及密切的政治关系。

在亚太地区之外,中国谋求提高其作为大国的地位。北京提出的双边外交就是试图扩展其角色并在国际论坛上发出更大的声音。中国还在寻找经济良机,提高它的国际影响和地位。反对台湾寻求国际社会承认将继续作为工作的重点。北京继续坚定不移地扩展其在欧洲、中东、拉丁美洲和非洲等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影响。但北京没有在这些地区建立军事存在的野心。

特别是关于台湾,北京坚持称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要求台湾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作为统一谈判的基础。中国坚持台湾应该参加在“一国两制”原则下、最终与大陆统一而进行的“政治对话”。中国指责台北进行的旨在扩大国际承认的活动。对台北来说,它拒绝接受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并要求北京在平等的基础上处理台湾问题。台北传统上宣布的统一条件是,中国取得与台湾所享受的经济水平和民主发展相似的成就。这中间,台北认为双方应该关注技

术上或程序上的问题,如文化和教育交流,以及解决由于台湾在大陆进行广泛贸易和投资而产生的商业纠纷。台北已主动开展工作来对抗北京在国际社会孤立台湾的努力。

北京和台北都已表示它们谋求和平解决两岸统一问题。然而,中国的领导人拒绝放弃使用武力对付台湾的权力。北京宣称,如果台北宣布独立或者有外国势力干涉台湾内部事务,将考虑使用武力对付台湾。同时,它将继续为应付这样的可能做好军事准备。另外,它将试图影响台湾的政治发展,防止台湾走向合法的独立。

尽管中国拒绝放弃对台动武的权力,但北京一贯强调要在“一国两制”的基础上,通过协商和平实现国家统一。一些中国人意识到与台湾发生战争可能是经济和政治上的灾难。中国国家政策的重点依然是经济改革和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下发展。为此,北京将避免那些可能威胁其经济增长、进入外国市场、获得投资和技术的行为。北京发动对台军事斗争,将冒危及其经济持续发展和政治立场的风险,特别是在那些与北京有未解决的边界争议的地区国家中。但是中国使用军事力量的决心不能低估。

C. 中国的军事战略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军事战略的重点是,为应付中国东南海域,特别是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可能发生的潜在军事冲突作准备。中国军事战略强调获得对抗台湾及其他地区军事力量增长的能力,而且为美国可能在任何冲突中介入作好准备。

北京的军事战略重视建设能快速部署并投入作战的野战部队,以赢得未来在高技术条件下周边局部战争的胜利。海湾战争和“盟军行动”生动地说明,北京需要提高人民解放军对付拥有先进信息技术和远程、精确制导武器的对手的战斗能力。中国对正在出现的军事技术革命的认识,已使其对部队具备高技术战争作战能力的紧迫性提高了。

中国军事现代化计划的一个基本目标是建立一支足以打败任何

地区对手的武装力量,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保护国家利益,维护内部安全,反对台湾独立,反对侵略。

尽管陆军现代化不是重点,但部队裁员和有选择地装备新型武器的目的,在于在较大规模的地面部队中集中建立一个具有较好机动性和作战准备的核心。当前,北京正在削减武装力量,而人员的减少将有助于重组人民解放军,使之成为一支包括以下三个组成部分的军事力量:在地区冲突中能灵活运用的小规模高技术部队;保卫内部安全、装备中低档武器的较大规模部队;保持对其他核国家进行有效威慑的适当核力量。

中国的军事领导人已经开始研究使用这些部队的战术。同时,为建设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军事院校和研究机构在军队建设中开始担任较为重要的角色。为在战时能支援和维持这些部队,中国也试图建立更有效的国家动员体制。

如果北京意识到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将试图控制和限制冲突,并将投入足够的部队,采用恰当的战术进行战斗,以便在外部力量军事干涉前、重要贸易和外国投资被扰乱前,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

如果有第三方军事介入中国参与的地区冲突,人民解放军将使用一切必要手段使其遭受巨大伤亡,以削弱其军事介入的决心。

II. 中国军事学说和部队结构的发展

A. 中国军事学说的发展

传统上,根据保持一支能完成各种内部和外部任务的规模庞大的武装力量的需要,中国的军事战略和部队规划重点已经确定。反映在武装力量构成上,就是中国将继续依赖以下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人民解放军 240 万,人民武装警察 130 万,预备役人员约 150 万。最近十年来,根据认识到的威胁变化,中国已对军事力量的规模和结构进行了重组。

十年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将战略重心从以毛泽东的“人民战争”为特色的持久、大规模地面战争,转向解决中国周边发生的小规模地区冲突。中国“积极防御”思想的核心是进行所谓的“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或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这个思想要求对中国的陆地和海洋疆域,特别是在包括东海和南中国海的战略范围内,可能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冲突作出快速反应。如果在这个战略区域发生的冲突关系到中国的利益,中国希望在对付像美国或日本这样具有较大技术优势的敌手时有思想准备。另外,中国和台湾一旦在台湾海峡发生冲突,美国势必会介入,这已成为指导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部队规划、军事训练和战争准备的主要方向。

中国的军事规划者正在引入由于“军事革命”而产生的现代战争概念,并将打赢在亚洲地区进行的快速高技术战争所必需的技术和战术置于优先发展地位。中国的军事战略依然有着不能消除的毛泽东思想的痕迹,特别是集中运用火力,由技术劣势部队在战场上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战胜优势敌人。其主要变化是将这些作战概念用在新的作战条件下,而不是传统的“人民战争”中。当前中国战略思想的核心是有限的高技术战争、保护中国的沿海经济中心、保证可靠的威慑以支持其外交政策的实施。

海湾战争给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家们带来了深刻影响,他们认识到需要为“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作准备。1999年北约在科索沃的军事行动,进一步增强了人民解放军追求“积极防御”和先发制人打击概念的迫切性。人民解放军的许多官员认为科索沃冲突是第一场纯粹的“非接触”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控制空间和信息系统成为决定性因素。他们日益认识到,未来战争同“非接触”战争一样,地面交战将被一再缩短,或不存在,空中力量将成为达成战术、战役和战略目的的首要手段。中国军事杂志最近发表的文章认为,南联盟和伊拉克部队被打败的原因都是过分被动,因而人民解放军应该做好争取战争主动的准备,并对打击敌人作战系统的关键目标给予高度重视。

中国的战略家们认为,如果爆发一场对抗技术优势敌人的战争,敌人可能会快速部署部队,然后发动一场大规模的空战。但是当敌人正在集结部队时,就存在发动先发制人打击的机会。这种途径——“通过首先打击获得主动权”——被看作是抵消具有军事优势的敌手的优势、或使其优势无效的有效方法。对敌人的最重要目标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即常说的“一击制胜”)是最直接的制胜手段,它让北京无需打败敌人的军队,而使敌人承认失败,或按照中国的目标来达成政治协议。这种战术要求集中中国自身的主要力量,来“攻击敌方防御的核心”,并通过对抗优势部队取得战役范围的渐进胜利。要达到这一目的,中国需要一个与当前的军事力量相比规模较小、机动性较好、具有更多的先进技术含量的军事力量。中国的多数研究、开发以及采购和训练计划,都是围绕完成这样的部队建设任务进行的。

中国国防工业总体的技术水平还远远落后于西方,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还没有能力制造能挑战像美国、日本那样具有技术优势敌人的武器装备。然而,人民解放军的观点是,像邓小平所提倡的那样,“有选择地发展少量精良武器”。其含义不是将发展重点从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改革转向人民解放军的全面现代化,而是集中力量发展有效的手段,利用对手防御中最关键的弱点给予打击。这种方法将使北京具备达成政治和军事目标所需的“可靠的威慑”,而不是依赖于占据压倒性的力量优势。这就是“以劣胜优”的概念。

中国的战略家们正在为人民解放军已经成功使用过的,或在未来20年可能将被使用的那些武器系统和技术寻求创新的战术。北京已将重点放在研制和采购远程武器,如“反舰巡航导弹”(ASCMs)、远程对地攻击巡航导弹(LACMs)和近程弹道导弹(SRBMs)。中国还在努力改进C³I训练薄弱环节,更加重视“电磁战”,以削弱或摧毁敌人的作战系统。

中国的军事规划者们认为,高技术系统极端复杂化和过分依赖信息系统是其潜在的弱点。他们认为,通过使用精锐部队集中对敌人

可能的薄弱环节实施快速打击,中国能够实现用“不对称”手段达成对敌人进行“对称”还击的目的。“逐步赢得战斗”意味着有选择地摧毁侦察、电子和支援系统,以瓦解和降低敌人协调空战的效能。信息战(如计算机黑客攻击)与非常规的特种作战及游击战相结合,将使中国有能力对敌人的作战系统发动毁灭性的攻击,同时避免主要力量的正面对抗。

这些意在与更现代化的潜在敌手交战的非对称战术和系统,也为完全打败较弱的地区敌手奠定了基础。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常规、低技术含量的武器装备,使北京具有对付潜在地区对手的决定性优势。中国的战略是使用足够力量使对手同意在北京的意志下进行谈判,尽快结束战斗以避免第三方干涉。

B. 部队结构现代化

人民解放军现代化的重点是发展导弹、空军和海军武器装备以及陆军快速反应部队。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要求建立精锐部队,以便快速对地区热点作出反应,并夺取陆地、空中、海上、空间和电磁战场的优势。

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很大程度上将依赖于防务资源的可利用性、国防工业的能力、外国技术和武器的获得,最终取决于人民解放军将这些系统集成起来用在军事上的能力。如果没有完成北京制定的经济目标,军队可能面临预算降低,这将减慢军队现代化的步伐。中国的国防工业已拥有一系列先进的俄罗斯和西方技术,但几乎还没有能力制造大量的高质量武器装备。如果北京的国防工业改革失败,人民解放军可能会变得更加依赖从外国进口武器。

中国试图继续发展自给自足的国防技术和生产能力。采购外国武器系统将主要是满足近期的关键需求,并获得外国的技术。然而,人民解放军还将继续过分依赖外国以获得关键的现代化武器和硬件、平台与技术,以及系统工程和集成。即使人民解放军获得他们所追求的现代化武器装备,但将这些系统集成起来并训练指战员使用

这些系统仍将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这也将制约人民解放军发展成为世界级的军队。

C. 增强军事能力的先进技术

1. 信息和通信的发展

a. 自动化指挥、控制、信息系统技术

中国拥有一个为军方和政府领导提供防护的坚固的地下隐蔽场所和指挥控制设施的庞大网络。60 和 70 年代时,由于担心会与前苏联发生战争,促使中国政府花费巨大财力和资源建造国家级的指挥所、民防设施和相关的通信系统。这些设施的建立是为确保中国政府的领导能力可以保存下去,并可继续维持对国家军事力量的领导。这些设施是靠军事和民用通信系统支撑的。虽然存在着民用通信网络和军用通信网络相互连接的可能,在危急时刻解放军可以利用民用通信设施,但军用通信网络极有可能是与民用网络相分离的。中国的国家级军事指挥控制通信系统是建立在多种传输系统之上的,目的是使军事通信系统具有较高的生存能力、安全性、灵活性和机动性,并且不易受到他人利用、毁坏和电子攻击。虽然中国的通信网络系统在遭受攻击后,其能力会有所下降,但不会被完全摧毁,因此在其国家领土范围内,仍然有能力维持国家对解放军作战行动的领导。

至少从 1979 年以来,C'I 系统的现代化和自动化成为中国发展的重中之重。在此方面的努力使中国研制成功了指挥自动化数据传输网络,此网络能使作战指令迅速地传达到各级指挥官,并可传输信息到国家级和战区级的决策者。但是,中国 C'I 系统的基础设施,包括指挥自动化数据传输网络系统,并不能在复杂的、西方式的联合作战中控制和指挥部队。不过此网络能在和平时满足解放军在中国境内军事行动的需要,还可以满足中国在其周边地区实施预先计划的、有限的常规进攻的需求。但中国的网络系统仍然远远落后于西方关于控制复杂联合作战的标准,并且缺乏适合现代战场上各种需求的灵活的 C'I 体系结构。